

傅殷才教授学术思想长青

武汉大学外国经济思想教研室（文建东执笔）

傅殷才教授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博士生导师,本刊主编,兼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等职。他生于 1929 年 11 月,不幸于 1996 年 7 月 9 日因病逝世。他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研究与教学工作凡 40 年。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的、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研究论著,以自己的高尚品格和广博学识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为本刊的创办并使其成为在全国较有影响的经济学核心刊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本刊、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及至我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在我们沉痛悼念他的时候,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外国经济思想教研室在较短时间内写出了这篇文章,初步地、简略地介绍了他的西方经济学学术思想。我们相信,研究傅殷才教授的学术思想和他毕生从事科研和教学事业的经验,对发展经济学科和经济学教育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对傅殷才教授的最好纪念。

——《经济评论》杂志编辑部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经济评论》杂志主编傅殷才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西方经济学专家。他早年留学莫斯科大学,1960 年初学成归国,自此便投入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是他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但就在他宏图大展、佳作频出之时,却因长期劳作,积劳成

疾,不幸于 1996 年 7 月 9 日,溘然逝世。凡是了解他的学术成就和工作业绩的专家、学者、领导同志、学校师生,闻此噩耗,无不感到震惊和痛惜!

在 40 年的学术生涯中,傅殷才教授勤于笔耕,成果斐然,共发表论文 100 余篇,学术专著 16 部(其中独著 5 部,主编 7 部,合著、参编

4部),译著6部,另主编丛书两套,堪称著作等身。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全国在该领域颇具影响、享有盛名的学者之一。在40年的学术研究中,他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独到学术思想,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是我们对他的西方经济学学术思想进行概括研究的初步看法。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经济学,正确地看待西方经济学

傅殷才教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他自始至终都清醒地、自觉地、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评价、分析西方经济学说。他的《以资本论为指导,研究和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西方经济学》两文集中阐述了这一研究立场。

傅殷才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学科分支众多,理论五花八门,其内容则良莠互见,益害并存,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是不能正确对待、准确扬弃的。“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研究好当代西方经济学,才能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可以吸收和借鉴的,什么是应当批判和摒弃的。特别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可供吸收和借鉴的东西,往往同庸俗的错误的理论混在一起,这就更加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入系统的科学分析,把一切可以借鉴的东西提取出来加以改造而不是兼收并蓄、照抄照搬。”

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说的二重性,将西方经济学区分为作为一般理论的经济学和作为实际专门研究的经济学。他认为,这种区分是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的原理为基础的。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既是资本主义价值增殖(即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又是社会化大

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过程;以前者为基础便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学,以后者为基础则形成了实际的具体的专门的经济研究。与此对应,西方经济学也显示出其二重性: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在根本理论上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其专门具体研究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实际,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经济技术关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他指出,对西方经济学一分为二,“可以防止两种可能发生的错误: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是庸俗而又反动的时候,就全盘否定,绝对排斥;当看到它在实际的专门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取得了某些新成就的时候,就眼花缭乱,顶礼膜拜,不作任何批判。”

他进而指出,将西方经济学一分为二后还应区别对待:从根本上严厉批判,而在具体问题上大胆利用。其一,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阶级性极强的学科,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因而从整个一般理论体系的本质来看,它是庸俗的,反共产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它的各个流派的差别,一般地说不在于是否庸俗,而在于庸俗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对此应采取否定态度,进行严肃批判。其二,西方经济学在分析和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在一些实际专门研究方面,多少包含一些有用成分,这些有用成分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有益的探讨。利用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深刻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从而更有效地对付帝国主义。

二、结合中国国情,研究西方经济学,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宏微观经济学

其实,对西方经济学,无论批判也好,利用也好,在傅殷才教授看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

是,批以“明目”,学以致用。因此,在研究西方经济学时,不仅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吸取有用成分,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宏微观经济学。在《吸取西方经济学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在经济改革中要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等文章中,集中体现了这一观点。

傅殷才教授主张,不仅要大胆,而且要善于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先进成果。首先,西方经济学成果对我国是否有用,判断的标准是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我们不能根据各派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国家是得势还是失势、流行还是过时而决定我们的取舍。因此,尽管凯恩斯主义的“高消费论”、“赤字财政论”和“通货膨胀无益论”等在西方大有市场,但不适合我国国情,故不宜引进。不顾实际情况引进这些观点的结果,是招致高通货膨胀等严重问题。而我们在企业管理改革、物价改革和建立市场机制等方面注意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获益甚多。同样,在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时也应循此原则。其次,应将西方经济学的借鉴与我国实际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研究西方经济学者必须立足国内经济建设实践,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者也必须掌握西方经济学知识。当然,这种结合还任重而道远。最后,要更为重视西方经济学中的具体应用研究,因为一般说来,在一般理论方面,西方经济学受阶级利益限制而缺乏科学性,但在具体应用领域则表现出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

那么,西方经济学哪些内容可供我们借鉴和利用呢?傅殷才教授归纳出如下主要方面:第一,在根本理论方面,虽然西方经济学主要命题是错误的无科学价值的,但可能有正确的个别方面,或者虽然是错误的、无科学价值的,却提出了问题,对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西方经济学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些有一定科学成分的有价值的方法。第

三,在具体的实际应用研究方面,西方经济学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现代大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客观物质技术关系或规律,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要求。第四,在实际材料方面,西方经济学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搜集、整理并汇编了大量的信息与资料。第五,在政策主张方面,西方经济学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出谋划策,设计了各种政策措施,使之得到广泛运用与实施,并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所有这些,我们都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加以利用。

傅殷才教授还进一步认为,研究西方经济学,也是为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认为,世界发展到今日,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列宁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马列主义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可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成果,因为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变化,也作了一些分析研究,其中不乏合理、科学之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等著作和列宁在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的过程中,都大量参考了他们那一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献。

三、涉足古往今来各派学说,述、评之中自成一家之言

傅殷才教授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锐利武器,广泛涉足经济学有史以来直至今日的各派理论。他对西方经济学的掌握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使之成为在这一研究领域最具发言权的学者之一。尤其可贵的是,他对西方经济学既“述”且“评”,融会贯通,有自成一派独到观点。

傅殷才教授在对西方经济学的叙述方面,体系新颖、完整,内容全面、系统,表达准确精当,充分显示了他对西方经济学的整体把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当代西方主要经济思

潮》《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等专著、《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当代西方十大经济学派》等丛书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这些著作中,他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有广泛影响与重要地位的主要流派作了细致全面的述评,显示了他西方经济学知识的深厚功底与广博见识。如果这还不足奇,则《经济学基本理论》一书就更显得慧眼独具。该书按专题与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评述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各种理论。在国内,该书不仅内在逻辑安排属于首创,而且对很多理论观点作了首次披露,如“资本民主化理论”、“阶级调和论”、“生活质量理论”、“科学技术进步理论”、“资本主义变形理论”、“制度趋同理论”及“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等。该书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新颖独到,别具一格。而他与颜鹏飞教授合著的《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更是匠心独运,以自由经营思潮与国家干预思潮之间的争论辩驳为主线,对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从一个全新角度再次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经两位学者之手,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两大思潮的风云变幻、交替更迭便跃然纸上。傅殷才教授的研究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紧紧跟踪西方经济学前沿之最新动态,及时地研究它们。当前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两大学派之一——“新凯恩斯主义”——便是由他较早在国内发表系统全面的述评的。要知道,新凯恩斯主义同新古典主义一样,大量地使用了高深的数学技术;曾有西方学者指出,该学派将因此而难以为人所理解。

对西方经济学做到述而后评,也是傅殷才教授一贯坚持的研究原则,他在所有的论文与专著中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傅殷才教授之“评”鞭辟入里,见解不俗。如《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保守派、自由派与激进派》、《当代西方主要经济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孰优孰劣?》和《试论近半个世纪来政府干预论与自由经营论两种经济思潮的兴衰交替》¹⁰等论文就包括了他对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评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关于西方经济学思潮的划分。西方经济学存在不同的流派和学说,它们之间存在广泛而深刻的分歧与争论,因而显得学派林立,各说纷呈,难于总体把握。但他认为,不同的流派或学说仍有内在的规律性,这就在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态度,完全可据此将它们区分为保守派、自由派与激进派三大思潮。保守派即新自由主义或新型自由经营论,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古典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弗莱堡学派、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及新政治经济学。它们崇尚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力主自由放任。自由派则常常和国家干预主义相联系,一般是指凯恩斯主义各流派、瑞典学派和制度学派。他们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激进派就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厌恶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推崇马克思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质的改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革命倾向,从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主张“改良”的角度考查,新剑桥学派、瑞典学派和制度学派可归类为温和的激进派。他对这三个思潮进一步总结到:“西方当代经济学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其使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至于激进派,它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立场是值得重视的,但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影响,达到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还有相当的距离。”¹¹他的这种区分是精当准确的,抓住了实质要害,可以方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西方经济学,更正确地认识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作此区分,是傅殷才教授首创的。

第二,关于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的比较。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的主张孰优孰劣?傅殷才教授明确回答道,国家干预也好,自由经营也好,其目标则殊途同归,其实质则异曲同工,无非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因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故谈不上孰优孰劣。而在具体政策上,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各有其积极意义,也都在实行的不同时间暂时缓

和了资本主义矛盾,起了一定作用,据此也不好谈孰优孰劣。就现代经济而言,政府干预与自由经营不可偏废,而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也不应谈孰优孰劣。倘若真要比,那就必须结合不同的国家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而具体考虑,来分析两派主张的实际经济意义。此外,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业已证明种种市场失灵的存在,说明政府干预必不可少,而自由派多少总承认一点资本主义弊端并提出一些补救措施,保守派却对弊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甚至为之辩护。而且,在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方面,保守派走得更远,更为猖狂,更为公开。

第三,关于西方经济学各派过去的回顾,现在的评估与未来的展望。傅殷才教授对这个问题也作了深刻的分析与可信的预见。就激进学派而言,它在过去与现在一直处于弱势,被视为异端,这种状况看来还将持续到未来。保守派与自由派同属西方经济学主流,二者在过去和现在从未间断过论战,虽然曾分别在一段时间内领尽风流,出尽风头,力量对比似乎趋向于旗鼓相当、平分秋色,但总的说来,自由派中的凯恩斯主义一直略胜一筹,雄踞西方经济学霸主宝座历史不落,屡受动摇而不垮。目前,作为自由派的新凯恩斯主义与作为保守派的新古典主义在理论上争论激烈,互不相让;在政策实践上则前者正东山再起而得势,而后者影响渐失而衰落。其原因在于,经济形势有利于凯恩斯主义。估计在未来,保守派欲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新的霸主是困难重重。这是因为,“他们在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在作17、18世纪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黄粱美梦,不懂得或不愿看到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不能适应新的形势”。¹²而“从根本上说,在当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不干预经济是不可能的,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正适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实践上适合国家干预再生产过程采取一系列措施的要求,适合垄断资产阶级追求最大

限度利润的要求”。¹³不过,保守派与自由派还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并存下去,并在影响西方国家经济政策方面反复出现交替更迭,但不论是哪一种思潮得势,都只能对资本主义的矛盾起一时缓和作用而决不可能消除由生产方式性质决定的固有矛盾。在大量的论著中,傅殷才教授还对许多西方经济学派提出的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里限于篇幅而不可尽录。

四、吸取外国经验,服务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

傅殷才教授在后期以主要精力研究西方经济学,但他仍始终关注着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在他看来,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目的是解决我国经济问题,做到洋为中用。为此,除了在评述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发表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看法以外,他还专门研究了许多关系我国经济建设全局的问题。例如,在《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中他集中地表述了自己的改革观。

首先,傅殷才教授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公有制基础不能动摇。他认为,如果搞私有化,那就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要不得的。国有制企业并不必然比私有企业效率低。明显的事实是,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也不乏高效率者,私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的事时有发生。西方国家还经常根据适应不同需要而有时实行“国有化”,有时搞“私有化”,这都是出于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目的。我们不应受他们的欺骗宣传的迷惑。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应实行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政府有责任制定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证市场交易活动的正常运行,但政府不应该代替市场起作用”。¹⁴应该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要求企业遵守法律、法规,照章纳税,而不在生产经营业务上对企业进行干预”。¹⁵至于市场调

节与国家干预如何结合,并无一成不变的模式,在一个时期可以是“多市场,少国家”,而在另一个时期又可以是“少市场,多国家”。总之要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作出正确抉择。

再次,在市场机制的建设上,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促进公平竞争。通过公平竞争,既鼓励了先进,促进了效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又可防止两极分化,逐步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

最后,在政府干预问题上,一方面要加强某些政府调节,这是针对某些局部失控而言;另一方面又应从总体上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例如可以通过健全各种法规并严格执法而强化某些干预措施,通过大大缩减政府开支而减少政府干预。

傅殷才教授一生效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经济学人才,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耕耘多年,结出了累累硕果,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¹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追求,以及他反对盲目学释西方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不妥协态度,在西方经济学研究者中是较为突出的,被公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及研究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典范。

傅殷才教授虽然坚信和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强加于人。他为人十分谦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意见。无论是在他主持的《经济评论》,还是在他领导的外国经济思想教研室,他都鼓励就不同意见展开讨论。坚持真理,坚持以理服人,坚持“双百”方针是他自己治学和指导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因此他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和影响所及的范围,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好

评。

傅殷才教授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我们应该继承这笔财富,为繁荣经济科学,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在我们为共同事业奋斗过程中,傅殷才教授将活在我们心中,他的学术思想一定会更加发扬光大。

注释:

傅殷才:《以资本论为指导,研究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

傅殷才:《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西方经济学》,载《社会科学动态》1991年8、9期。

傅殷才:《吸取西方经济学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习邓小平同志有关西方经济学的论术》,载《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4期,第8页。

傅殷才:《在经济改革中要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外国经济学研究)》1987年。

傅殷才:《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新凯恩斯主义述评》,《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

11 傅殷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保守派、自由派与激进派》,载《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7期。

傅殷才:《当代西方主要经济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孰优孰劣?》,《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0 傅殷才:《试论近半个世纪来政府干预论与自由经营论两种经济思潮的兴衰交替》,《世界经济》1982年第2期。

12 13 傅殷才主编:《新保守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14 15 傅殷才、颜鹏飞:《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

16 摘引自国家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6年7月15日唁电。

(责任编辑 杨宗传)